

一生将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怀念父亲戴宜生

○戴西维 戴建西 戴西山



戴宜生学长

2016年3月16日，我们深爱的父亲因肺部梗塞引起的心肺衰竭，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88岁。父亲的离去，给我们留下了无尽悲痛和永远的怀念。

父亲戴宜生1928年10月15日出生在重庆江北。祖父戴自牧任重庆金城银行经理，曾自费公派留学日本。祖母杨培静，娘家经营着历史甚久的川帮银行——聚兴诚家族银行。

一、父亲的童年与青少年

父亲在重庆读巴蜀小学。快毕业时，日本帝国主义对抗日后方的重庆开始实施狂轰滥炸，烈火与炸弹毁掉了老重庆大半个城。父亲经常是迎着冲天火光，拾级而上，穿过废墟，绕过许多死尸，才能进到小学校里读书。小学读书期间父亲跳了级。毕业后，因祖父当时任金城银行西南管辖行的经理，鉴于形势遂决定让家属先

行迁港，祖父继续在渝经营。祖母带伯父、父亲两兄弟去香港读中学。

1939年秋父亲入香港岭南中学读初一，伯父也入岭南中学，比父亲高一班。父亲在香港青山湾度过了少年时光。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时，父亲他们才在训导主任黎寿彬老师的带领和指挥下，撤离青山。父亲记得当时在青山湾海面上有日本飞机与英国巡逻快艇空海交火，黎老师带领着全体同学步行走回港九（有17英里远），沿途见到过路的汽车就拦，从最小的学生起，能让汽车搭乘一个学生算一个，剩下的就由他继续带着慢慢走，多少年后父亲脑海中还保留着黎老师的英勇形象。后来，祖母带着伯父、父亲，随大批熟人，步行经沙头角，穿日本封锁线，历经数十天艰难跋涉，来到广东惠阳以北（当时惠阳火光冲天，国军与日军在争夺此城），搭上汽车，经韶关、桂林，回到老家重庆。此后，父亲就读于重庆南开中学。父亲在中学又跳了级，1944年读高二时考入昆明的西南联大经济系，当时的父亲还不到16岁。1946年夏，父亲复校到北平清华大学，1948年毕业时成绩名列前茅，系里给他一个到美国留学的全额奖学金名额，他马上表态说家里可以让他自费留学，让系里把这个名额留给经济条件不好的贫寒学子。

二、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 的地下组织，并倾其所有 为地下党提供大量经费

父亲从小过着优渥的生活。祖父送伯父留学美国，也特意为父亲准备了留洋基金，以供他以后出国留学。但是，父亲选择了为广大受苦受难的人民求解放的伟大事业，放弃安逸富裕的生活，毅然参加了地下党，不但把爷爷给他的留洋基金全部用作地下党组织的活动经费，还说服了最爱他的妈妈——我们的祖母，卖掉了红岩村的一栋陪嫁的楼房，拿出大笔金钱做地下党活动经费。解放前夕，重庆、武汉、贵阳、香港等地下党组织经费出现困难时，领导有时就让他们去找父亲解决。祖母看到来取钱的地下党同志破衣烂衫，不仅给钱，还给买身新衣服让他们换上。以至于在上世纪80、90年代，还有一些当年在最困难时期受到父亲和祖母资助的地下党员找父亲表示感谢。

1948年6月，不满20岁的父亲从清华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即由党组织派遣回老家重庆，在重庆大学当助教，开展地下工作。1949年5月中旬一天，重庆大学校长张洪沅通知经济系主任罗志如说：“特务逮捕名单上有戴宜生，让他赶快走。”罗连夜安排一名助教来通知父亲。经与地下党同志刘康商量，父亲尽快将他领导下的党员、“民青”骨干安排疏散。一周后等到父亲从重庆飞香港时，机场已是军警严密封锁。幸得祖父因商务与之同行，在机场上又正好遇见去送客的国民党官员张群。祖父与张群因有银行业务往来相熟，见面相互寒暄，军特见此不敢骚扰，父亲



青年时代的戴宜生和李淑琼

方得以平安登机赴港，虎口脱险。

1949年11月父亲和母亲李淑琼一起参军加入了刘邓领导的二野，参加了解放大西南的战斗，突破国民党川鄂湘防线，占领秀山、酉阳、彭水等地。父亲的地下党上级领导、解放后曾任内务部部长钱瑛大姐帮助父亲母亲喜结良缘。

重庆解放后父母由二野转入重庆市军管会、重庆市公安局，在杨正凡处长和申锐真科长的手下工作，得到了他们的悉心培养和教导，迅速地成长起来。由此杨戴两家结下深厚的友谊。“文革”中，杨正凡伯伯和申锐真阿姨一家收留了他们的女儿西维。当时父母受冲击有一年多没有寄生活费来，杨伯伯申阿姨隐瞒了这个消息，待他们的女儿如己出，使她能够健康地成长。

三、艰苦卓绝的雪域长歌

1951年父亲母亲参加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大军。1951年5月，父亲从成都出发到甘孜，翻山越岭，步行一周到达，随后被编入先遣支队。他仅仅带了一个装有简单物品的小背包就上路了，自豪地认为自己是到神秘西藏的“清华第一人”。母亲当

□ 怀念师友

时正怀着身孕，一路上风餐露宿，妊娠反应很大，吃不下饭，经常以野果子充饥，造成女儿在母亲腹中极度营养不良，后来所有的牙上面都没有珐琅质，40多岁开始就不得不戴上牙垫才能吃东西。1952年初女儿出生在拉萨，为了向往和平也为纪念与西藏人民的友谊，父母给她取了一个藏名“西维梅朵”，汉文就是和平之花的意思。因为当时西藏物质极度匮乏，梅朵体弱多病，一岁多还不会走路，于是父母打了一对小木箱，里面絮上棉被，把孩子装在木箱里，放在驴背上，雇藏民赶着毛驴，走了一个多月，翻山越岭回到内地。后来又生下了两个儿子，三个孩子一直放在北京亲友家寄养。多亏亲友们的悉心照料，孩子们才得以健康成长。直到1978年调回北京前，父亲与子女相处的日子屈指可数。但父亲对西藏的经历却刻骨铭心。一个从小锦衣玉食的人，放弃安逸的生活，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父亲说，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是只要想起在西藏所经历的，就好像是昨天的事。那是一种脱胎换骨的体验，是我父亲一辈子也忘不掉的，父亲梦中还常常梦到西藏那些事。父亲80岁高龄时又回了一次西藏，满足了情牵梦萦的西藏情结，也代我母亲一起圆了一个美丽的返藏之梦。

我父亲母亲始终心系高原。1951—1978年父亲一直在西藏公安厅工作，1978年调回北京，曾在公安部一局、外事局、研究所工作过。1990年从公安部研究所离休。1990年以后还继续积极参加犯罪学理论的学术研讨活动，去美国学术交流半年。

父亲积极参加南开同学和清华校友的

活动。南开同学和清华校友们赞誉他真实坦诚，有情有义，幽默风趣，才华横溢。每次聚会父亲都会给人带去欢乐，所以大家都昵称他“戴宝”。同学们也对他关爱有加，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多亏了南开同学汪兆悌阿姨的大力帮助，他才能够告别人世之前减轻了许多痛苦，我们子女对此没齿难忘。

回顾父亲的一生，我们由衷地佩服他心地纯良，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优渥富裕的生活和赴美深造的前程面前，他选择了和受苦受难的人民站在一起，投身革命，参加共产党，冒着生命危险，搞地下工作。在西藏高原缺氧的条件下，坚持工作近三十年，身体受到了极大的损害，他衣带渐宽终不悔，仍然心系高原，两袖清风，一身正气。最终肺部大面积损伤，因肺衰竭不幸去世。

父亲非常喜欢小孩子，尽管不能陪着我们成长，但是在我们的关键时刻，他都给我们以贴心的指导。

父亲博闻强记，酷爱读书，幽默风趣，谈笑风生。经常给后辈讲故事，讲人生百态，后辈都非常喜欢他，深深怀念他。

父亲对亲人，同学，同事，朋友都非常真诚。他多次资助有困难的老同学和西藏已故同事的子女，资助西藏同事全家进京游览。

父亲对母亲一生挚爱，临去世的前一天，还轻轻抚摸着母亲的照片，流下了深情的泪水。

纵观父亲的一生，我们看到了一个顶天立地的大写的人。父亲，我们永远怀念您。如果有来生，让我们再续父女父子缘。